

政府在提升公民幸福感上大有可为

——评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肖汉字*

Derek Bok (2010).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46PP.

虽然幸福观已经有了二千多年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是把幸福看作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和目标的现代幸福观只有大约两百年的历史（麦马翁，2011：320）。而关于幸福的实证研究则只有更短的历史。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幸福的实证研究。博柯的这本书以这些实证研究为基础，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政府与公民幸福的关系。

一、作者简介

德里克·博柯（Derek Bok）是美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1971—1991），并且于2006—2007年再次担任哈佛大学临时校长。在任期间，他改革了哈佛的行政管理工作，监督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建设，该课程后来成为哈佛本科教育的基本框架。他提倡增加女性本科生的人数^①。201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幸福的政治学：政府能够从新近的幸福研究成果中学到什么》（*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

* 肖汉字，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更详细的信息可参考哈佛大学的网站介绍：<http://www.harvard.edu/history/presidents/bok>

being.) 一书。全书共分为十一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第一章是对近来较新的幸福实证研究进行评估。第二章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博柯认为虽然幸福的实证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些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是值得肯定的。第三章则探讨了决策者是否应使用这些研究成果。在剩下的章节里,博柯则集中几个关键的领域探讨政府如何促进公民的幸福感和政府面临的挑战。

二、幸福的研究发现

目前,学者已经对哪些因素促进或者阻碍人们的幸福感达成了一些共识。博柯通过文献评估发现:除了遗传特性之外,婚姻状况、社会关系、就业状况、个人感知的健康状况(perceived health)以及政府质量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六大因素(Bok, 2010: 17)。已婚人士的幸福感要高于那些单身、离婚、独居、同居或者未婚的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结婚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而可能是那些更快乐幸福的人更倾向于结婚。结婚与幸福的增加是相互影响的。可以肯定的是,婚姻的结束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巨大的痛苦(Bok, 2010: 17 - 18)。其次,一些研究者发现,人们的各种关系和人脉网络会比其他因素带来更高的幸福感。虽然研究者还无法测量工作满意度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失业将会给人们带来持续的失落感,以至于失业人群更容易自杀,意志消沉,或者沉溺于药物和酒精。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失业会损害个人自尊,使得他们害怕失去他人的尊重(Bok, 2010: 20 - 21)。有意思的是: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似乎比客观的健康报告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最后,在政府的质量方面,博柯指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尤其重要。经济自由、法治、高效的政府部门、低犯罪率与腐败、对政府官员的信任以及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这些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Bok, 2010: 22 - 23)。

博柯认为,目前研究者的共识是:遗传因素可能最多在50%的程度上决定人们的幸福感,但是仍然有50%的幸福感是由人们面临的环境、抉择以及经验的事件所决定的。这意味着仍然有很大的空间通过人为的干预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而政府的政策行为无疑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干预手段(Bok, 2010)。因此,这就突出了该书的重要观点:政府在提升公民幸福感上大有可为。

三、幸福研究的质量评估

第二章主要是对幸福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估。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测量个人的幸福感。第一种被称为“经历抽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在一天不同的时间点询问人们的感受。这种方法能够回答哪些平常活动与幸福密切相关。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成本太高,而且也很难找到足够大的样本(Bok, 2010: 32)。第二种方法是“回顾评价法”(retrospective evaluation),比第一种方法的使用更广泛。这种方法采用李克特量表让受访者对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幸福感受打分。这种方法的劣势在于,个人的生活往往是较为复杂的,他们有可能记不清楚自己经历的事情,或者选择性地记住一些事情。人们往往会把很多经历的意义放大。博柯认为,在评价这些回答的质量时,我们应该区分“不准确”(inaccurate)与“不合理”(unreasonable)两种情况。不准确的回答指那些并未反映受访者在相似的环境下真实的感受或者正常人的感受。这些回答可能是不可信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如果受访者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同一个问题有截然不同的回答,那么这个回答是不可信的(Bok, 2010: 35)。

问题的顺序和短暂的情绪波动会导致不可信的回答。如果这种短暂的因素只是影响到单个受访者的情绪,那么这对大样本的调查的信度是没有影响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因素影响到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的情况,但是博柯认为研究者通常能够熟练地解决此类问题。除此之外,人们仍然可能会受到一些长久性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大样本和设计很好的问卷也无法准确而有效地测量出人们真实的幸福感。例如,人们有可能倾向于向研究者夸大自己的幸福感。这种偏误会很可能在不同文化的人群里会不一样,因此博柯认为,在解释跨国幸福感的差异时要特别小心,但是这种偏误对国内幸福研究却没有太大的影响(Bok, 2010: 36)。虽然人们在对自己整体幸福感做出评价时会出现偏差,但是博柯认为这种偏差总体上是随机性的,这种随机性偏误会被大样本的调查所消除。退一步讲,即使一个持续的、大范围的偏误是存在的,问卷仍然能够准确地测量出受访者自身对幸福的真实感受,而不管这在外界的观察者看来是多么地“不合理”(Bok, 2010: 37)。然而,博柯并未充分地阐述“不合理”与

“不准确”的区别。但是从他的分析来看，他所认为的“不合理”应该是从受访者以外来判断的。总之，博柯认为“不合理”并不是影响幸福调查的主要因素，而问卷是否准确而有效地测量出受访对象的真实想法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总之，博柯认为，研究者已经有不少研究可以检验经验数据的准确性。例如，受访者的幸福感与他们身边的人对其幸福感所做出的评估是密切相关的；开心的人会笑得更多更真实（Bok, 2010: 38）。博柯还将幸福感与GDP、失业率等数据进行比较。总之，博柯认为，研究者有各种技术以保证较准确地测量人们的幸福感，幸福感至少与目前政府所采用的主要测量指标有同样的准确性。

四、决策者应该使用幸福研究的成果吗？

博柯的态度很明显，政府应该使用关于幸福的研究成果，以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首先，博柯认为即使是调查显示人们的幸福感十分稳定，政府仍然需要努力促进民众的幸福感。美国有1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很不幸福”，这是三千多万人口。即使这些人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政府的能力所不及的，但是仅仅是帮助小部分比例的人群，就能够改善上百万人口的生活质量（Bok, 2010: 27）。其次，博柯分析了决策者在人们的幸福感中扮演的角色。博柯认为决策者不应该把自己认为是幸福的有价值的活动作为公共政策强加给民众。决策者的责任是最大限度地最大化民众自己所认可的幸福感（Bok, 2010: 42, 46），因此决策者首先必须了解哪些因素能让民众更加幸福（Bok, 2010: 59）。由于人们往往对哪些因素会带来幸福有着非常糟糕的认知，而这种基于偏误的甚至错误认知的幸福感是不值得提倡的，因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努力使得民众逐渐地准确认识哪些因素对幸福是重要的。

博柯认为幸福是公共政策的一个恰当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公共政策应该致力于解决那些持续给下层群体造成不幸的众多因素，例如失业、精神疾患、缺乏医疗保障（Bok, 2010: 51）。那么政府是否应该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参考幸福的实证研究呢？博柯认为，决策者应该充分地利用幸福的实证研究结果，以了解哪些因素会让民众更多幸福，而不是接受民众对幸福的糟糕认知（Bok, 2010: 59）。

五、具体领域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章节，博柯分别从经济增长、不公平、财政困境、疾病、婚姻与家庭、教育以及政府质量等七大方面深入地论述了目前美国幸福感的状况。博柯指出，经济增长并未相应地提高民众的幸福感，我们对经济增长的依赖反而是带来了更长时间的工作、更大的压力和不安。有经济学家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生活水平。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具有道德价值（Bok, 2010: 68）。博柯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驳。但是讽刺的是，如果没有了经济增长，政府将会陷入困境，那些昂贵的支出项目就无法维持，即便是目前的支出项目也会陷入更激烈的谈判困境（Bok, 2010: 71）。博柯也探讨了几种试图消除经济增长的方案，但是并没有多大的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公民也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博柯认为，在民众的认知改变之前，政府很难在此有所作为（Bok, 2010: 77）。

第五章主要讨论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博柯认为，富人比穷人的幸福感要高并不意味着收入再分配就能够提高穷人的幸福感。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不平等并未使得穷人感觉到更加不幸福。第二，美国民众不太可能把收入不均归结于社会，他们大部分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应有的回报（Bok, 2010: 81）。博柯更认为收入不均会带来社会凝聚力的下降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Bok, 2010: 83）。虽然高收入者往往比低收入者更加长寿，但是这个差异并不是由于收入差异所造成的，而更多的与民众的社会地位、自主性、权力等因素有关。要改变这些因素，单靠收入再分配是无法解决的（Bok, 2010: 85）。从收入与平等的角度来看，政治平等要求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政府也应该平等地回应不同阶层的需求，但是调查显示政府更积极回应富人的需求，富人比穷人更愿意参与政治活动（Bok, 2010: 89-90）。博柯认为这种差异与富人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地位权力有很大关系，单靠收入再分配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从机会平等的角度看，博柯认为政府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政府可以降低婴儿的死亡率早产率以及减少母亲照顾婴儿的困难，也可以增加措施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等。博柯认为更公平的机会很可能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Bok,

2010: 96 - 97)。

财政困难同样会带来不幸，特别是对失业者和老年人而言。美国的人均医疗投入虽然比其他任何国家要高，但是其覆盖率却非常低，仍然有4 000 ~ 5 000 万人未有保障，至少2 900 万人未得到有效保障，这些主要是穷人(Bok, 2010: 107)。在减少失业造成的影响这方面，博柯认为美国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做得都要差，政府极少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Bok, 2010: 110)。因此，博柯认为政府在退休、医疗保障以及控制失业三方面都大有作为，建立一个更全面完善的保障体系，以减少这个群体的不安与痛苦(Bok, 2010: 121)。

疾病同样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痛苦和不幸。其中，慢性病、失眠以及忧郁症是影响美国人的三大疾病，而且影响范围非常广。例如报告的慢性病患者达到5 000 万。但是这些疾病都没有被政府列为优先考虑解决的疾病。只有很少的慢性病患者寻找治疗，而更少的人能够获得医生的有效治疗(Bok, 2010: 124 - 125)。同样糟糕的情况也发生在失眠症和忧郁症患者身上。博柯认为，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并且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鉴于婚姻与家庭对幸福的影响，博柯认为决策者可以增加一些措施以促进人们的幸福感。例如教育，减少婚外孕，鼓励低收入者结婚，提高父母对儿童的照顾等(Bok, 2010: 143 - 146)。

由于民众对哪些因素是决定幸福感有很糟糕的认知，因此博柯认为教育是改变人们错误认知的主要手段，而学校和大学应该肩负主要责任(Bok, 2010: 156)。但是目前公立学校和大学都过分地强调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开设的课程也是职业导向的。而在公民教育、政治参与、培养公民责任、艺术欣赏等方面，公立学校 and 高校是做得远远不够的(Bok, 2010: 160)。学校可以开设课程告诉学生目前关于幸福研究的发现；让学生参与到幸福的实践活动当中；帮助老年人发展能够促进幸福的兴趣爱好；以及更好地帮助学生寻找真正喜欢的职业(Bok, 2010: 171 - 176)。

政府的运作以及民众认为政府是怎样运作的对民众的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Bok, 2010: 179)。博柯的评估发现，美国民众的幸福感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政府权力的碎片化，行政部门有过多的相互矛盾的规则，政府绩效低下的领域大都与穷人和工人阶级有关(Bok, 2010: 185 - 186)。

然而，改变政府的结构或者持续提高政府官员的质量似乎都不太可行。一个可行的方案是提高政府的办事程序的质量，减少利益团体对决策过程的影响。除此之外，要引导民众对政府的正确认知。博柯认为，目前民众对政府的评价是有很大偏颇的，而媒体也没有客观地引导民众（Bok, 2010: 192）。因此要从学校开始改革，以培养民众对政府有一种正确的了解与认知。

六、若干思考

博柯认为政府在提升公民的幸福感的上是大有作为的。幸福一直被认为是个人的责任，很少有人提及政府的角色。莱恩（Lane, 2000）在《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认为，市场经济制度与民主政治制度并未提升美国公民的幸福感，进而对美国现有的制度进行反思，但是莱恩并未回答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与莱恩的视角稍微不同，博柯在梳理了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总结出给人们带来幸福或者不幸的几大因素，对美国现有的几大重要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并为决策者进行适当的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因此该书值得公共行政的学者与实践者阅读与学习。

第一，收入不均与幸福感的关系。博柯的研究认为美国的收入不均并没有使得美国民众怨恨社会。这个发现与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12）在《不公平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的观点相矛盾。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经济被1%的精英阶层所控制，市场和政治制度都无法确保美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虽然斯蒂格利茨没有明确地论述收入与美国公民幸福感的关系，但是他隐含的观点是收入不均与美国公民的幸福感有关。当然，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值得商榷。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收入不均是否会影响到公民的幸福感？最近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高位，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6。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这里面有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原因恐怕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公共政策公平正义性不足以及对公权力约束较弱所造成的（汪玉凯, 2012）。这些原因都与政府有关。因此从收入不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治理水平似乎是更重要的影响公民幸福感的因素。

第二, 社会保障政策对公民的幸福感受影响很大。博柯认为, 政府应该加大对退休、医疗保障和失业人群的财政投入以减少该群体的不安与痛苦, 增加对重大疾病的重视, 加强对婚姻与家庭的教育引导。这些都可以增加公民的幸福感受。同样, 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还是不高的。虽然在短期之内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投入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政府完全可以在一些方面有所作为, 比如与公民组织合作, 加强对婚姻与家庭的教育引导。

第三, 政府的运作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知对公民的幸福感受影响很大。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目前公民对政府, 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并不高, 官民矛盾较大。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政府的服务质量之外, 另一个原因是民众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容易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 以偏盖全。从这个角度来看, 政府怎样提高优化自身服务和正确引导媒体与公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麦马翁 (2011). 幸福的历史.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汪玉凯 (2012). 中国基尼系数超 0.6, 利益格局严重扭曲。第 76 次中国改革论坛.

Bok, D. (2010).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ne, R. E. (2000). *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iglitz, E. Joseph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W. W. Norton & Company.